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中国社会的 阶层与流动

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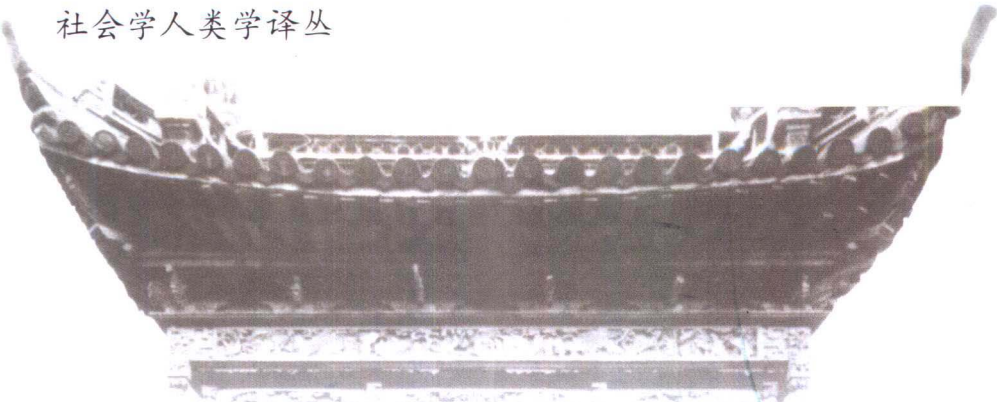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Gentry Identity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周荣德
著

学林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中国社会 的阶层与流动

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Gentry Identity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周荣德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周荣德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12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ISBN 7-80616-969-5

I. 中... II. 周... III. 阶层, 士绅-研究-中国
IV. D693.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04 号

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

——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作 者——周荣德

责任编辑——黄 晶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6.1 万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7-80616-969-5/C·31

定 价——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以在云南省昆阳县多年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及权力体系中的核心阶层——士绅阶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描述,较为明晰地阐释了士绅阶层的起源,阶层特征,社会功能,生成方式乃至阶级属性,并重点强调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式秩序和士绅流动性生成的多种途径。书中引用了大量真实、详细的士绅分子个案生活史材料,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生动、丰富的士绅生活图景。

此书原文为英文,书名为《Social Mobility in China》,作者为周荣德(Yung-Teh Chow),1966年由美国纽约的Atherton Press出版。近年来由作者自己译为中文,本书是中文版的首版。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 能	刘世定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 星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1985年和1987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一直在他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

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在发展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又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在调查研究中检验来自国外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必须来自对于我国社会的深入研究。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以学术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我们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积极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因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发展一度中断,有许多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社会学和人类学创立于西方国家,本世纪初叶被介绍到我国,不少经典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社会学人类学重建的过程,又有一些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被介绍到国内,促进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促进了我国学科重建工作。当此世纪之交,对于我国社会

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仍有重大价值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著作,我们感到仍有必要组织进行翻译,同时也非常需要把一些反映国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及时向国内学者和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生介绍。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组织编辑翻译出版了这一套《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与此同时,我们与华夏出版社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同时正在筹备共同编辑出版《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人类学》。为了使《高校经典教材译丛》能够达到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组成了一个跨学校的编委会,并邀请了海外一些关心此事的青年学者参加。这两套高校经典社会学、人类学教材,是以大学本科生为主要对象。

根据这一变化,我们把《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定位于以研究生和专业研究人员为主要对象的翻译丛书,主要选择的是一些经典研究名著以及公认在一定领域有影响的研究生教材。这套译丛可以在层次和对象两个方面与我和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相互配合,互相补充,共同推动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在《社会学人类学译丛》第一批选题中有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撰写的《社会学》,这是一本在欧洲和北美各高校十分流行的本科教科书,这是我们在确定参与《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编委会工作之前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选定的并联系好版权,所以仍放在《社会学人类学译丛》中出版,我们在今后的选题中将更为偏重经典名著和研究生教材。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和《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两套系列丛书,我们希望这三套丛书以及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人类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中国土地、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10 月

导 言

这本书在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科学著述方面，尤其是对共产党当政前中国的社会学领域来说，是一个辉煌的贡献；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作者在云南省一个县份多年深入研究中国士绅问题以及当地城乡广泛社会问题的成果。虽是关于实地调查的著述，作者的分析和理论探讨赋予本书以广大的视野和意义。从而使之超越作为一份民族社会调查报告的局限，而成为在一般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中占有稳固地位的著作。

实地调查主要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书中包括 47 个士绅（大）家庭的生活史，其所涉及的人物不下 1,200 人，追溯他们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许多方面，都是用极其丰富详实的材料编写的。虽则其个案研究的社会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延

很广,对中国社会中的各色人物、家庭和阶层集团的形象,却刻画得精细生动。个案中的一些戏剧性遭遇读起来如现代小说的情节一样引人入胜。作者如实地反映真相,态度之客观公正令人钦佩,读者将会感到旧的道德规范的崩溃就迫在眼前了,也会清楚地觉察到共产党或者其他革命倡导的社会新秩序即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四十年代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了昆阳研究站,由周博士担任主任。调查工作是由几位助手协同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进行的,但有些却一直延续到1948年,后一部分工作是由一位当地的助手在昆阳做的。由于研究所在昆阳举办过全县人口普查,并继办人事登记,使作者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社会,搜集当地士绅生活史以进行深入的研究。调查工作者经过长期的访问和接触熟悉,得以完成了包括当地所有主要士绅和地方官吏(亦系士绅阶层中的一部分)在内的生活史录。在家庭个案研究方面,家史和世系至少追溯到五代,从而可以看出长时期内士绅地位的表现方式,流动手段的运用与实践,以及行为方式的持续和变迁。

当地社会大致分为三个阶层:处于这个农业社会底层的众多的农民,少数的士绅阶级和一小撮官吏。后者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代理人,他们尽管也是士绅阶级的一部分,而与地方士绅是有区别的。

昆阳县的官员和中国各地的官僚分子一样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对于他们,农民通常是不敢接近的,因而士绅就成了他们和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官僚的衣冠绝不许普通农民穿戴,他的官服,绸袍马褂和令人敬畏的官衔,使低贱的农民不敢靠近他。官僚分子不像地方士绅,是外地来的,但当地士绅

中也有不少过去曾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昆阳过着上层阶级的优裕生活。

关于官僚的地位,在一个县长的自白中有坦率的叙述,他说他和僚属不可能“自己去接近农民”——因为士绅分子、读书人是“群众的头头,操纵公众舆论”,“不可能摆脱他们”;“事实上,县长如果完全不同他们(士绅)合作,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而且还有丢官的危险”。

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收入非常微薄;其中大部分过着贫苦的日子。根据调查,在昆阳全县的 10,000 户中,地主占极小的百分比,仅为 2.99%,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也分几等。不雇工的自耕农占农户的 47%,44%属于更下等的农户,这两种普通农民合计共占总农户的 90%以上(44%最下等的农户,按其生计属于“赤贫”之列)。

根据农户的人口普查,64%的农户其家庭成员无一受过教育,属于“文盲户”。当他们与中央政府从外地派来统治该地的官吏打交道时,最需要依赖士绅分子做中间人。他们既然属于最低下的阶层,就要挣扎,希望能提升为较上等的农民。农民阶级的家庭要进入下等士绅的行列,起码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作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士绅,系当地有权势的家庭所组成;在另一意义上,从外地短期派来进驻的官吏家庭自然也属于这个阶级。学者、退休官僚和读书人虽也与士绅阶层有关连,但士绅阶级的核心则为大地主,其次是富商。这些名义上经营农业的人自己却不种地;他们依赖向承租其田地的佃农收租过活。其他如医生、教授和其他高等教育工作者等自由职

业者的家庭也包括在士绅阶级之内。士绅对教育极为重视，无论是旧学或是西学。

士绅和官僚的财富靠猖狂的贪污搜刮而来；农民们把钱财当作礼物送给士绅，藉以取得受礼者的照顾和帮助。

士绅也可按几种尺度和区域范围来划分；例如：官僚做官时间的长短和职位的高低，地主田地的大小，富户财产的多少。其次，他们还可以按在地方上的显赫程度加以区分，有的显赫于一村，有的知名于一乡，有的威望及于全县，更有的势力影响可以高达于省，这样，士绅的地位有高低，层次分明。

无论是从理想还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讲，士绅的家庭是大家庭，而不是小家庭。它通常由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小家庭所组成，包括一些兄弟辈、父辈和子辈的小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个人有其自己的地位和各自进取的机会，他可以出外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上闯地位，成名和发财。当他回到家乡，他的成就可以使大家庭更光耀乡里。由于他对大家庭有所贡献，从而也提高了他自己在这大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所以个人或小家庭努力进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和提高这大家庭在整个士绅集团中的地位。

许多士绅家庭保持了他们的地位达几世纪之久；有些被称为“书香世家”或高级军官的“一门武人”。所以子孙的责任就在于继承家庭的传统而使后代保持住家庭的光荣。

在士绅家庭中做儿子，处境格外困难。如果家境在士绅阶层中是很低下的，他责无旁贷，要努力攀上更高的地位，从而使父母和周围的亲属都能抬高身份。如果他是颇有声望家庭的儿子，其任务则是使家业兴旺，以保持或增加大家庭集体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国家正面临社会骤变的混乱局面，想取得

这样的成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流动的途径已不复存在了。

士绅们在这个开放的阶级制度里可以采用各种社会流动的方式，固然可能达到最高层的地位，但作者的那些追溯长期变迁的家庭史录却表明，一个人或家庭要爬到高一阶层是一个历时几代缓慢上升的过程，需要几代人慢慢累积钱财和改善家境的努力。再者，就是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发迹者也并不显得容易些；因为他们要化费时间学习交往应酬，在那些复杂的仪式中显耀他们的地位和财富；还要购买和置备士绅分子所居住的大宅院，单是士绅的仪表风度也须耗费钱财才能训练出来。

按照中国传统的职业分类，士居首位，农其次，随后是工，商最低，但是事实上，商人金钱的力量大有助于他取得实实在在的高级地位。身为学者的士绅们许多在暗地里是经商的股东。并且，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会赚钱的人捞到了高地位，或许是靠非法的手段，不过仍不如一些军政官僚。

作者相当注意社会流动的各种方式。显然，有些家庭可能采取几种方式。作者选择每个家庭所用的主要方法，来研究个人和子孙如何使用这个方法。他讨论到的主要社会流动方式有进学校受教育、行医、参军、从政、经商、高攀的婚姻以及革命与造反。

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也许是晋升为高等士绅最令人敬仰和最光荣的途径。行医是与从政同样受人尊重的道路。在旧教育制度下，地方学校，尤其是村学，凡是家庭经济能够负担的子弟都很容易进去；甚至家境不宽裕的子弟，只要父母肯自己刻苦勤俭，也可以入学读书的。按当时的制度，想上进的人

去私塾读十年书,他就能够住在家里,到学业结束时如果碰上点运气,并有些才干,他就能谋到个官职。但在模仿西方的新教育制度下,读到大学毕业,需要十六年时间;而对于有志青年来说最要紧的还是必须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才能接受高等教育。这个变迁不仅需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花钱要多得多,因此就连许多小康人家也无力送儿子进大学受高等教育,把他培养成新中国最受欢迎的新人。并且穿长衫的旧学者已渐渐失去了权威,而穿西服的新人才变成了高职位最有希望的候补人了。学生中最吃香的是那些出国到欧洲、日本或美国并取得更高学位的留学生。

所有这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上进的道路在大部分士绅以及富裕的农民面前立即堵塞了,许多人家的子弟已不能再走过去读书上进的道路来争取更高的成就了。

在民国的后期,中国传统文化仍被重视的年月,对那些立志上进的人们,婚姻主要看他学业的成就。“门当户对”是家庭间通婚结亲的理想,自然是双方地位相等的意思。若是双方家庭地位不同的婚配,例如有钱人家的男青年与有政治势力家庭的女青年定亲,结果常是被人认为是合适的交易。但是这种合适的交易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其中牵涉到价值观念不同的因素。比如一个贫苦虔诚而忠厚的男青年也有可能被看作是大富商的女儿合适的丈夫人选。这个青年出身虽低贱而其家庭却有忠厚品德、好的名誉,因此他就提高了身份。在周的记载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事例。通过经商、开矿、制造业和其他办法积累财富,仍然是人们提升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总之,财富能够转化为别种得到高贵评价的社会阶梯。

旧体系日益瓦解,军事的影响随之大增,结合军职晋升获

取政治前途，是常用的手段；内战给军人提供了实现雄心壮志的大好机会。就在这一时期，农村和小城镇的大部分壮丁外流了；据人口迁徙的登记，这些迁出的壮丁中大约有 73% 是外出服兵役的。军官和士兵的出身往往不同，前者来自中、上级的士绅家庭，后者来自农民家庭。两者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军队中晋升快也容易，速成的功绩常常紧接着就使一个人变成了军官和士绅。军校免费，许多人就走这条路。

少数下贱的农民由此跃居显赫的地位并颇有威望。有些怀有野心的军人投靠有高级职位的人做门徒，很快被提拔到待遇优厚的职位。这些暴发户并非是唯一利用军队的门道往上爬的人，著名的军官世家仍继续通过传统的军事训练这一渠道把青年一代培养出来。

周的研究所得的结论，美国研究社会阶级的学者无疑可拿来与我们自己那些凭社会流动上升的精英人物做比较。很明显，我们的精英人物和中国的一样有世家出身和由流动上升的两种。不过中国的世家要远比我们的古老得多；而且他们靠流动上升的精英人物中有些直接来自农民，有的则是由低级士绅上升。中国靠流动上升者所面临的问题，比起我们自己那些流动人物所受的挫折也是差不多相同的。在中国从农民晋升上来的人物，必须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比升上来的美国人甚至还要改变得大些，由于新的教育，实际上已把他的文化从完全中国的变成部分西方的了。世袭的精英人物或许仍可依循传统的模式，但是他们的青年后代也必须离开父辈的荫庇，去寻找他们自己的阳光了。

在中国开放的阶级制度里，士绅们虽然高高在上，却允许低下层的人上升，可是在旧社会濒临崩溃的时期，伸缩性却逐

渐解体而成为无组织的了。所以中国的革命与其说是由于阶级制度的严峻或官僚制度的刻板,毋宁说是由于中国进入了世界性的体系而变为更新的社会,而在这改革的社会中,旧阶级制度不能适应或不适用,结果在革命中终于解体了。

旧制度的失败有的说是由于道德败坏,措施不当或其他各种原因所招致的;又有的说新兴的共产主义的成功是由于道德完善无缺,有着坚强的思想体系或采用科学的、新的社会措施的结果。现在这样来议论是很容易的,这些看法也可能全是真实的,但如此推断似嫌过于肤浅了。中国要适应新的世界形势,旧社会也会像别国经历过的一样发生迅速的变化。无论是哪种情况,周博士所研究的士绅都不会像过去那样地保持到现在了。社会需要做,而旧的和新的士绅都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魏廉·洛艾·华纳

W. Lloyd Warner

英文版序

本书的宗旨在试用社会流动的理论构架并藉有关的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其加以验证；同时考察一个中国县份的社会阶层体制和流动。本来前者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社区作为必要的社会实证，而试图分析社会流动的各个方面及其过程，从而提取任何有用的概念，将是极为困难的。本书当然不能自命为对所研究期间的中国社会史作了全面的考察。它的范围只限于有关社会阶层及其流动的课题。

自从皮蒂利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1927年发表他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一书以来，在社会学这个领域里还未曾有过其他全面性的研究(见D. V. 格拉斯《英国的社会流动》，纽约1954年出版，第5页，注一)。索罗金这书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分析透彻，但或许是它所包括的时间过长和空间过广，作者在一些囊括无遗的概述中表现自信，致使书